

張承吉文集十卷

（唐）張祜撰

宋刻本。

框高十九·七釐米，寬十四·四釐

米。每半葉十二行，行二十一字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

張祜（約七九二——約八五三），一作張祜，祜、祐二字形近，極亦相混。明胡應麟《詩藪》云：「張祜字承吉，刻本大半作祐，覽者莫辨。緣承吉字，祐、祜俱通耳。一日，偶閱雜說，張子小名冬瓜，或以譏之，答云『冬瓜出瓠子』，則張之名審矣。」此後便以張祜為正。

張祜，字承吉。清河（今屬河北）人，一作南陽（今河南鄧縣）人，郡望清河。初依李光顏，後寓姑蘇（今江蘇蘇州），曾謁白居易。長慶中（八二一——八二四）令狐楚表薦之，因至長安。但為內臣所抑，一說為元稹所抑，未被任用，遂至淮南。會昌中（八四一——八四六）曾與杜牧遊。祜性耿介，數受召幕府，輒自劾去。因愛丹陽曲阿古澹有南朝遺風，於是築室種植隱居於此，直到去世，故又號張處士。大約卒於唐宣宗大中年間，享年約六十餘。

張祜早年多作宮體詩，以宮詞得名。晚年則崇尚建安風骨，詩風轉向樸實。《唐詩

紀事》稱其「短章大篇，往往間出。講諷怨譎，時與六義相左右。善題目佳境，言不可刊置別處，此爲才子之最也」。令狐楚表薦他時亦說他「凡制五言，苞含六義，近多放誕，靡有宗師。祐久在江湖，早工什篇，研幾甚苦，搜象頗深，輩流所推，風格罕及」。可見張在當時很有詩名，並為一些有識之士所推重。

歷代著錄和傳世的張氏文集，有一卷本、二卷本、五卷本和六卷本。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著錄張祐詩僅一卷。元辛文房《唐才子傳》亦說張祐「詩一卷，今傳」。明朱警輯選唐人詩歌，於嘉靖十九年（一五四〇）刻成《唐百家詩》，其中中唐二十七家，第二十一家即《張處士詩集》，凡五卷。還有一部所謂翻宋十行十八字本《張處士詩集》，亦為五卷，與朱氏《唐百家詩》所收相表裏。清劉世珩於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輯刻《貴池先哲遺書》，其中收有明正德本《張處士集》，亦是五卷。康熙四十一年（一七〇二），洞庭席啓寓琴川書屋輯刻《唐詩百名家全集》，其中有《張祐詩集》二卷。揚州詩局所刻《全唐詩》，收張祐詩亦為二卷。吳壽暘所輯吳騫《拜經樓藏書題跋記》卷五，謂「《張處士詩集》凡六卷，無序目」。由此可知，唐以來傳世的張承吉集多為一、

二、五、六卷本，尚未見有十卷本流傳。

此書則為宋蜀刻十卷本，其珍稀價值不言而喻。傳世宋蜀刻唐人文集有兩個系統：一為十一行本，約刻於南北宋之際，今存駱賓王、李太白、王摩詰三集；一為十二行本，約刻於南宋中葉，今存世者尚有十九種，其中包括十卷本的《張承吉文集》。十行本蜀刻唐人文集，書中遇「構」、「溝」、「慎」等字皆不缺筆，而於光宗趙惇御名「惇」字和嫌名「敦」字則皆缺筆避諱，表明其刻已屆南宋中期。與現存蜀刻唐人文集相勘核，此本版式行款、字體風格、印紙墨色如出一轍，因疑其為叢刻散出者。據程有慶對蜀刻唐人文集叢刻的考證，宋王楙《野客從書》卷五，出現了《唐六十家詩集》一名，但未說明由誰在什麼地方出版。宋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·王右丞集》提要稱：「建昌本與蜀本次序皆不同，大抵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多異於他處本。」王楙生於南宋紹興二十一年（一一五一），卒於南宋寧宗嘉定六年（一二一三），福州福清人，所著《野客從書》分門類聚，鈎隱挾微，考證經史百家，下至騷人墨客佚草佚事，細大不捐。所記《唐六十家集》，在他下世前十七八年已經行世，當為親眼所見。陳振孫雖晚他三四十

年，但陳乃著名的目錄學家，所謂「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多異於他處本」之說，絕非無稽之談。這證明四川眉山地區於南宋中葉刻過一部《唐六十家集》。明代楊士奇等核編的《文淵閣書目》卷十，仍著錄兩部殘宋本《唐六十家詩》，說明歷史上確曾有過《唐六十家集》叢刻行世。據此，此蜀刻十卷本《張承吉文集》當是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中的一種，故此本可定為「南宋中葉四川眉山地區刻唐六十家集本」。

此本與其他存世的宋蜀刻唐人文集，在元代均藏宮中，開卷有「翰林國史院官書」長方印鑒可證。明、清亦為內府藏書。清初有名劉體仁者，順治進士，歷官吏、刑兩部郎中，可以入閣看書，隨看隨借，便將多種蜀刻唐人文集帶回家中。此本鈐有「穎川劉考功藏書印」，劉考功即劉體仁。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（李致忠）